



中国卷

ZHONGGUO JUAN

教育名著评介

JIAOYU MINGZHU PINGJIE

高时良 主编
黄仁贤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教育名著评介

JIAOYU MINGZHU PINGJIE

高时良 黄仁贤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名著评介·中国卷/高时良,黄仁贤主编. —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34-5551-4

I. ①教… II. ①高…②黄… III. ①教育学—书评
—中国②教育思想—思想史—中国 IV. ①G40②G40-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6137 号

教育名著评介·中国卷

高时良 黄仁贤 主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33693 83706771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591-87115073

印刷 福州源峰彩印有限公司

(福州晋安区官前路 7 号 邮编: 350014)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4.5

字数 465 千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5551-4

定价 49.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前 言

《教育名著评介·中国卷》的编撰工作，始于2008年6月。在此之前，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明德、金锵主编的《教育名著评介·外国卷》，希望我们也组织一些专家学者编撰中国卷与之配套。由是我们拟定了写作提纲，邀请国内部分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编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09年8月撰就了初稿。但因各地作者在写作形式和风格上的差异，统稿花费了相当时间，加之出版社出版任务繁多，以至现在才与读者见面。

本书的编撰，旨在通过对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教育论著及其作者的教育思想进行较为详实的介绍和评价，以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阅读和研究中国教育名著提供一些帮助。因而，我们确认入选本书的教育名著必须是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演变产生过重要影响者，就理论而言，或者有独到见解，或者有所突破与创新，或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名著的作者则是中国教育史上颇具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实际编撰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教育名家（如蔡元培、陶行知等），尽管著述等身，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但又难以用某部论著来全面概括他们的教育思想体系，只好选择“教育文选”、“教育论著选”或“文集”、“全集”进行梳理。

由于学术视野、编撰水准所限，本书定然存在诸多瑕疵与疏漏，如有些应收录的名著可能尚未收录，有些名著及其作者的评介尚不够客观全面，有些篇章的撰写还有待深化等。敬候学界方家以及广大读者的不吝赐教与宝贵意见。

本书编撰过程中，对学人学术成果的参阅与借鉴，在此深表谢意！本书的编撰，得到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全力支持，特别是赵莉和孙丹两位编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高时良 黄仁贤

2011年11月26日

目录

contents

高时良:	孔丘与《论语》	/1
高时良:	墨翟与《墨子》	/17
高时良:	孟轲与《孟子》	/27
陈晓蕾:	荀况与《荀子》	/38
尹逊才:	戴圣与《礼记》	/51
王伦信:	董仲舒与《春秋繁露》	/63
王伦信、吴 臻:	王充与《论衡》	/79
孙培青: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95
孙培青:	韩愈与《韩昌黎集》	/115
李世宏:	王安石与《王文公文集》	/136
杜成宪:	张载与《张子全书》	/149
黄书光:	朱熹与《朱子全书》	/168
金忠明:	王守仁与《传习录》	/180
李世宏:	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	/197
李世宏:	王夫之与《船山遗书》	/205
石焕霞	颜元与《颜元集》	/216
杨卫明:	张之洞与《劝学篇》	/232
简占东:	康有为与《大同书》	/246
陈明霞:	梁启超与《饮冰室合集》	/257
黄仁贤:	严复与《严复集》	/270
杨卫明:	蔡元培与《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279
涂怀京:	胡适与《胡适全集》	/293
陈家顺:	杨贤江与《新教育大纲》	/307
杨卫明:	晏阳初与《晏阳初教育论著选》	/321
郭少榕:	梁漱溟与《梁漱溟教育文集》	/336

涂怀京:	陶行知与《陶行知全集》	/348
黄仁贤:	黄炎培与《黄炎培教育文集》	/363
念焯:	陈鹤琴与《活教育理论与实践》	/372



孔丘与《论语》

◎高时良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史记·孔子世家》说“其先宋人”，《礼记·檀弓》记孔子自道“而丘也，殷人也”，那是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作为宋国宗室，传至孔子的八世祖孔父嘉，即改姓孔，到三世祖孔防叔，据说“畏华氏之逼”，由宋迁鲁，鲁昌平乡陬邑便是孔子的出生地，后世便以他为鲁国人。鲁国是周公旦（周武王弟）之子伯禽的封国，《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所以尽管到春秋中期，鲁国的经济和政治都走下坡路，而作为礼乐之邦，保存下来的文物典籍，即传统文化，表明“周礼尽在鲁矣”。《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依《阙里述闻》记载，孔子小时已经领会了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开始学习五礼、六乐、五射、五御，以及六书、九数，《论语》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此“学”亦主要为待人处事之道，到“三十而立”，如《论语·泰伯》篇所说“立于礼”，浅解为懂得礼仪，此亦进道之要。立于道、于礼，要皆统于学。

孔子之前，学校也好，图书也好，都集中在奴隶主贵族的宫廷里，所谓“学在官府”。随着奴隶制土崩瓦解，周天子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树倒猢猻散，那些原在宫廷里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文化人也流散到各地，如《论语·微子》所



说的“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私学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孔子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规模较大私学之人。相传杏坛是孔子当年讲学所在地，《庄子·渔父》有“休坐乎杏坛之上”句，但远不是建于今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之杏坛^①模式。

孔子何时开始讲学授徒，史籍记叙不同。《史记·孔子世家》、吕善《圣门志》说是十七岁，那时鲁大夫孟懿子与南宫敬叔都“往学礼”，胡仔《孔子编年》、程复心《孔子论语年谱》说是二十二岁“始教于阙里，颜路、曾点、琴张之徒往受学焉”，司马贞《史记索隐》则说是三十五岁。参照《论语》记载，似以后一说较合乎逻辑。《史记》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自非一开始就那么有规模，有个从小到大，从微到显的过程。何况《诗》《书》礼乐内容都十分深奥，非有高深的学问和高度的道德修养，不足以担此重任，也难做到“弟子弥众，至于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本着“有教无类”，收受的弟子不仅来自五湖四海，家庭成分也包括富贵贫贱。除了个别出身贵族，如孟懿子、南宫敬叔，还有子贡经商，“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绝大多数为平民或接近平民阶层：子张“鲁之鄙家”，曾参“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仲弓为“贱人”之子，颜涿聚曾是“梁父之大盗”，子路卞之“野人”，曾“冠雄鸡，佩豶豚，陵暴孔子”。再则是互乡，其地名声不好，有童子来，孔子亦表示“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和“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②。《史记·儒林列传》概括孔子弟子的成就及其对时代的影响道：“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这与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密切关系。

《论语》全书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依《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梁皇侃《论语义疏》说的更为详尽：“《论语》者，孔子没后七十弟子之门徒共所撰录也……微言一绝，景行莫书，于是弟子金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成而实录，上以尊仰圣师，

① 顾炎武《日知录》有《杏坛》条，说：“今之杏坛乃宋乾兴间四十五代孙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甃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耳。”

② 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保，斤斤计较之意。



下则垂轨万代。既方为世典，不可无名。然名书之法，必据体以立称，犹如以孝为体者，则谓之《孝经》；以庄敬为体者，则谓之《礼记》。然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

其以“论”“语”二字名此书，先“论”后“语”，而不先“语”后“论”，汉末训诂学家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皇侃的《论语义疏》也说“先儒后学，解释不同，凡通此‘论’字，大判有三途”：其一，“舍字制音，呼之为伦”；其二，“舍音依字，而号曰论”；其三，“伦、论二称，义无异也”。就“舍字制音”为“伦”来说，大抵不出四家：“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轮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就“舍音依字”为“论”来说，皇氏认为“此书出自门徒，必先详论，人人金允，然后乃记，记必已论，故曰论也”。就“伦”、“论”二者无异来说，“盖是楚夏音殊，南北语异耳。南人呼伦事为论事，北土呼论事为伦事，音、字虽不同，而义趣犹一也。”皇侃以为，“三途之说，皆有道理，但南北语异如何似未详，师说不取，今亦舍之。而从音依字二途，并录以会成一义。何者？今字作‘论’者，明此书之出，不专一人，妙通深远，非论不畅；而音作‘伦’者，明此书义含妙理，经纶今古，自首臻末，轮环不穷，依字则证事立文，取音则据理为义，义、文两立，理、事双该，圆通之教，如或应示。”至于“语”、“论”先后问题，则是：“‘语’是孔子在时所说，‘论’是孔子没后方论，而今不曰‘语论’而云‘论语’者，其义有二：一则恐后有穿凿之嫌，故以‘语’在‘论’下，急标‘论’在上，示非率尔故也。二则欲现此‘语’非徒然之说，万代之绳准，所以先‘论’已，以备有圆周之理，理在于事前，故以‘论’居‘语’先也。”

《论语》早遭焚烬，汉时合壁所得和口头传授，乃有三种本子：《古论》（即《古论语》）、《齐论》（即《齐论语》）、《鲁论》（即《鲁论语》）。篇章亦微有不同：《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别为一篇，有两《子张》，合二十一篇，唯孔安国为之训说，而世不传。《齐论》与《鲁论》大体不殊，但多出《问王》与《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内容亦不与《鲁论》同。《鲁论》二十篇，即后世所讲习者。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鲁论》，兼讲《齐论》，所谓“择善而

从”，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①，东汉灵帝时所刻熹平石经，即采《张侯论》。至后汉时，南郡太守扶风马融、大司农北海郑玄，就《鲁论》篇章，考《齐》验《古》，为之注释。汉鸿胪卿吴郡包（亦作苞）咸、魏太常东海王肃、博士敦煌周生烈亦皆为之义疏。往后便是魏末吏部尚书南阳何晏，因《鲁论》，集马融等七家，并采《古论》孔安国注，参以己意，作《论语集解》；南朝梁国子助教吴郡皇侃引卫瓘等十三家之说成《论语义疏》，其援证精博，亦为世所重。惜前此诸家所注疏均亡佚，于今只能于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余萧客《古经解诂》等书中见其一鳞半爪，却弥足珍贵。

二

孔子的教育学说，见之《论语》，也见之《左传》、《国语》、《中庸》、《孟子》、《史记》，而集中于《论语》，内容涵盖教育同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教育目的，教育作用，教学内容，教学原则与方法，以及如何当一个合格的教师，如何交朋友等，可谓全面而深入。剔除其中的历史局限，作为古典教育理论体系，放之四海而皆准。

孔子生当社会大动荡的春秋时代。一方面，阶级分化引起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如《季氏》所说“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土地所有制从宗室向家族转移所引发的政在大夫和庶人议政，这也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从大小诸侯国到大夫间相互倾轧乃至兼并，造成战事频仍；自然灾害又加重了人民生活的困苦。孔子企求社会稳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胜残去杀”（《子路》），其理论基础“择乎中庸”，含有通过政治渠道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意蕴，《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为哲学范畴，这个“和”迥异于“同”，后者否定矛盾和斗争，无原则地盲从附和，“中”，也不是折中主义，无可无不可。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不像“小人”那样“同而不和”（《子路》），《国语·郑语》也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杂以成百物”。孔子即常以中庸，或者说“中和”之道来规范自己和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并用以教导弟子们。“中和”意味着和谐发展，唯和谐才能达到发展，如上述的“和实生物”。和谐又是全面而永恒的和谐，包括：（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如在家庭中做到“父子笃”（《礼记·礼运》）、“兄弟怡怡”（《子路》），

^① 《汉书·张禹传》：“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肖望之、韦玄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寢微。”



在社会上做到“与人忠”（《子路》）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在朝廷中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在此似可解释为相互尊重。后汉郑玄还说“君臣之接如朋友”（《六艺论》），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尹和靖言“君臣，以义合者也”，皇侃《疏》“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二）〕。（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论语·述而》记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所谓“钓而不纲”，是指一根钓竿只有一个钓钩，取鱼有节制，与张大网横撒于广水取鱼就不一样。“弋不射宿”指不夜射栖宿之鸟，宿鸟总是一大群，伤害面太大。孔子这样做，诚如缪协所注，“将令物生有路，人杀有节，所以易其生而难其杀也”。至于孔子教育弟子们“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这也是保护生态环境和劳动力的一种措施。（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见之《论语·颜渊》，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此“兄弟”当亦包括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其彼此间相互交往，也不自春秋始，《尚书》的《大禹谟》和《旅獒》即有“四夷来王”、“四夷咸宾”的记载。又《论语·子罕》的“子欲居九夷”，意亦不管这个地区如何贫穷落后，反正都是咱们自己人的“家”，所以孔子不嫌其“陋”，尽管他也讲华夷之别，如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同‘无’字）也”。（四）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和谐关系。《尚书·尧曰》：“……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此“邦”字即指诸侯国。如《地理志》所说“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邦’，此之谓也”。诸侯国间不相互攻打，实现社会稳定，对老百姓有好处。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孔子认为那是“管仲之力”，称赞其“如其仁，如其仁”（《宪问》）。卫灵公请教孔子如何部署兵阵，孔子辞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次日便卷着铺盖离开卫国。孔子不是不懂军旅之事，亦非完全不教军旅之事^①，主要是希望卫国不要动不动就同其他国家兵戎相见。

在孔子的教育蓝图里，要造就什么样的人，大体可以概括为士、成人、君子三个层次。

下焉者为“士”。这虽是起码要求，条件亦不简单。《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要经受恶衣恶食的考验，像颜渊那样箪食瓢饮，仍不改其乐。正因为士“任重而道远”，故“不可以不弘毅”^②。子贡曾经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回答：“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是高标准。次一等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再次一等则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但亦不失其为士。（《子路》）

^①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康子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

^② 《泰伯》记孔子弟子曾参语。



中焉者为“成人”。《宪问》记子路问如何为成人，孔子回答：“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其次，如“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也算得“成人”。朱熹《论语集注》，“成人”犹言“全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说苑·辨物篇》：“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辨，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飭躬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认为“成人”为成德之人，最所难能”。

上焉者为“君子”。这对孔子来说，是最高要求，所谓“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其见于《论语》记载也最多^①。就衡量其修养水平来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修养。如《泰伯》：“君子^②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又《子张》：“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二是道德修养。如《颜渊》：“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又《阳货》：“君子义以为上。”

三是文化修养。如《雍也》：“君子博学于文。”又《颜渊》：“君子以文会友。”

四是生活修养。如《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又《卫灵公》：“君子忧道不忧贫。”

《子路》记樊迟请教孔子如何学种稻种菜，孔子辞以不娴熟此道，意在希望樊迟能为人上人，即当官，或者说当统治者，所以讲了一套道理：“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用不着打赤脚下田地。后来子夏也讲“学而优则仕”（《子张》）。曾有人批判孔子的教育目的只鼓励学生当官，是典型的读书做官论。其实，从历史看，西周从建朝起，凡属贵族阶层，不管阿猫阿狗，其子孙都无条件地享受爵禄。《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孙子，本支^③百世。凡周之士，不（丕）显亦世。”《毛传》注“不显亦世”，谓“士者世禄也”^④。西周铜器铭文如《师虎簋》、《鬲鼎》、《趯尊》等都有类似记载。则无论孔子说的上好礼、好义、好信也好，子夏说的“学而优”也好，都意味着必须是文化和道德修养过硬，还有办事能力，才容许去当官。这种从思想到政治上对世官世禄的否定，有其积极

① 有人统计，《论语》中“君子”凡101处。

② “君子”在此指当官的。

③ “本”为大宗，“支”为小宗。

④ 此“士”字同“仕”。《孟子·梁惠王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



意义。当官不是不可以，但必须为国为民，克尽厥职。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

在估量教育的作用方面，孔子或多或少看到教育受一定的经济、政治的制约。生产没搞上去，老百姓生活没得到改善，就谈不上教育。《子路》有一段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管子》的《治国》篇曾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汉刘向《说苑·建本》赞赏孔子的“富然后教”思想，认为“此治国之本也”。但历史发展又不是光靠政治或经济单枪匹马，文化教育的作用也不容低估。孔子后来退而修《诗》《书》礼乐，讲学授徒，意亦试图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首当其冲是对统治者的教育，“不教而杀”、“不戒视成”（《子张》），都意味着暴虐无道。

教育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便有“性”与“习”哪个方面占主导地位的问题。《阳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里的“性”，是指人的自然本性；“习”，则指社会习染。自然本性是对与生俱来的禀赋而言，旧注所谓“人所禀而生也”，后天习染又有环境影响与教育传授的不同，前者带有自发性质，后者则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即要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性”与“习”作为心理与教育命题，首见于《尚书·太甲上》，相传商代早期，伊尹告诫初继位的太甲说“兹乃不义，习与性成”。

孔子讲学知，也提到生知。“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中庸》）但此“生知”，只是虚拟词，亦如近人所谓“虚悬的一格”。《季氏》有一段话：“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此“生而知之上也”可解释为：如果生来什么都懂得，当然最好。但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孔子强调学知，说“弗学何以行”^①。他最反对“困而不学”，明确地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要做到“学而不厌”，活到老，学到老。《述而》记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一时没有回答。孔子知道了，说“女（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孔子的教育内容，依《论语》等书记载，既有《诗》、《书》、《易》、《礼》、《乐》、《春秋》的“六书”，又有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既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四科”，又有文、行、忠、信的“四教”。而依其性质说，似可概括为德、智、体、美四育：

首先是德育。它的核心便是“仁”。《论语·颜渊》点出仁者爱人，这个“爱”是有原则的，《里仁》所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其表现为人文主义

^① 东汉徐干《中论·治学篇》引孔子语。



精神，在于对普通老百姓，那时叫庶民、庶人的关爱，如《学而》的“泛爱众”和“节用而爱人”，包咸注后一句说“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也”。其从政治和思想情感上把“爱”下移，也基于春秋末叶，随着农、工、商业的发展，争取和保护劳动力成为重要课题。“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现实主义思想即由此而发。

孔子重视仁，也重视礼。一方面，他赞赏西周奴隶制社会的典章制度，即周礼，讲究尊卑，反对僭越；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在言行上对礼的性质、内容也有所订正，如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孔子有时把政治和道德准则归结为仁，如说“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有时又归结为礼，如说“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其次是智育。如历史知识，“六经皆史”，包括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论语》内容就蕴含着哲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以及文化教育史料。见于《先进》记叙的宰我、子贡长于言语，子游、子夏长于文学，都属于智育范畴。

复次是体育。如射、御，最早用于征战，属于军事范畴。在孔门，便成为“艺”，属于体力活动，不是或不完全是武艺。射在技术上比高低，属于文争。《论语·八佾》：“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由于习射亦须习礼，所以孔子又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

再次为美育。如音乐，包括唱歌、鼓琴瑟、观赏大小型演奏。它与《诗》相联系，所谓“《诗》乐同物”，《史记·孔子世家》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声乐器乐，他都有一两下，或用以为教学内容，或用以为教育手段。《论语·阳货》记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之以疾，却又“取瑟而歌，使之闻之”，意在试探孺悲是否真心崇道归圣，如后人李充注解：“弦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绝，则矜鄙之心颓，而思善之路长也。”^①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活动中，德、智、体、美的关系是：以德育为主轴，各育内容相互渗透。《论语》虽无明确提出德、智、体、美结合，却强调智、仁、勇并举，《中庸》所谓“三达德”。《宪问》：“君子之道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又《子罕》：“知（智）^②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庸》也记孔子言：“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认为“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三达德”精神与四

① 文见《阳货》皇侃《疏》。

② “知”字在这里当作鉴别真伪和善恶能力解，有智育成分，也有德育成分，才说“不惑”。



育是一致的。

孔子从其长期实践经验中升华出系列教学理论,包括原则、过程与方法等,反映在《论语》中,主要有:

1. 因材施教

孔子弟子来自四面八方,社会成分、经济状况、年龄、资质、性格、知识水平、道德涵养,以及兴趣爱好、生活方式各殊。作为教师,自要多同学生接触,深入了解,掌握其思想与学习等情况,如孔子所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有了这样的活档案,对不同情况的学生,就可以“因材施教”。例如同是问“政”,孔子回答子贡,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回答子张,为“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回答子路,为“先之劳之”和“无倦”(《子路》);回答仲弓,为“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由于对弟子们情况了解深透,他们的将来去向,即能担当什么,胜任什么,自可成竹在胸。《雍也》有一段对话:“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表明对子路、子贡、冉求经过长期考察,可以放手让他们去治理政事。《先进》记冉求、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的回答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又《雍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由于受教育者智力和知识水平有高低,接受程度有快慢,教学内容便有深有浅,有难有易。循序渐进,下学上达,这符合规律。曾有人为了批判孔子,硬把“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当作社会阶层高低来注解,这就不恰当。孔子弟子中多数为“中人”和“中人以下”的普通平民,孔子决不会对他们讲“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至于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那就不够明确。除非生来白痴,或生理、心理方面有严重缺陷,“下愚”通过努力学习,亦可上升为上智;同样,原来智力较高者,不学习求上进,亦将降为下愚。

2. 启发诱导

教学是教师与学生双边活动的过程。只有教师动,而没有学生动,或只有学生动,而没有教师动,都难以提高教学质量。《述而》揭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先解释“愤”“悱”。皇侃《疏》:“愤,谓学者之心思义未得而愤愤然也;悱,谓学者之口欲有所谕而未能宣,悱悱然也。”朱熹《集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次解释“启”“发”。皇侃《疏》:“启,开也;发,发明也。言孔子之教,待人心愤愤,乃后为开导之,若不愤,则不为开也;又待其口悱悱,而后乃为发明之,若不悱,则不为发明也。”朱熹《集

注》：“启，谓开其智；发，谓达其辞。”至于正方形四个角相等，教师只须提示一个角，其他三个角让学生去触类旁通。朱熹《集注》“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不复再告。颜渊对孔子的教育启发深有感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又《先进》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有一次侍坐，“各言其志”。首先是子路发言，“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面对子路的一番话，“夫子哂之。”继之冉有、公西华发言。最后是曾皙讲“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含蓄地说：“吾与点（曾皙名点）也。”意为我同意你的想法。子路、冉有、公西华离开后，曾皙私下问孔子：“夫子何哂由（按指子路）也？”孔子答：“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此“为国以礼”，便是给弟子们一个暗示、启发：大言不惭，有失谦虚！《阳货》还有“予欲无言”句，此“无言”也是一种启发、暗示，让学生自己去思考。

3. 学思结合

人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升华。《论语》中的“学”，作为丰富感性认识来理解，就是耳多闻目多见。《述而》：“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这里的“知之次也”，或是对《季氏》的“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次也”而发，或是对“多见而识之”而发。“识”，义为记忆。仅仅是记忆，而不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即未经鉴别真伪而付诸实践，只能说“知之次”。但“闻”、“见”毕竟是认识的第一步，因而尤其需要“多闻”、“多见”。孔子教导子张，便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为政》）。但“多闻”、“多见”本身还只停留在感觉阶段，还属于感性认识范畴。对外界事物的认识由浅到深，由片面到全面，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到本质，光靠感觉是不够的，这说明思维的重要性。《论语》记孔子讲述学习等过程中应有的思维活动，或者说独立思考，常以“思”字来表达，如《季氏》的“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让为学处事不犯或少犯错误，不走弯路，正确而理智化。但光是“思”，就变成无根之木，靠胡思妄想过日子不行。孔子就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可见“学”与“思”是“相资以为功”，未可舍此而就彼。所以孔子着重提倡“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何晏《集解》：“不学而思，终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皇侃《疏》：“夫学问之法，



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义。若唯学旧文而不思义，则临用行之时，罔罔然无所知也……又若不广学旧文，而唯专意而独思，则精神疲殆，而于所业而无功也。”

孔子关于学思结合的思想，除了《论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外，《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范畴，“慎思”“明辨”属于“思”的范畴，二者不可分割。东汉徐干的《中论·治学》也引孔子的话说：“弗学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子夏当年就深有体会地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4. 文行协调

中国古代，在哲学史上，有知行合一观，在教育史上，有学行一致说。在《论语》中，又有文行协调的论述。此“文”字，许多地方都指书本学习或书本教育。《述而》记孔子言：“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意思是：书本上的学问，我同他人不分上下，在生活实践中体现一个君子作为，我还得下一番工夫。《雍也》的“博学于文”，也是指广泛吸取书本提供的知识。子路有一次不假思索地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严肃地批评他“是故恶夫佞者”！（《先进》）书，不是不应该读，要在读好书，当然也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要善于运用书本提供的知识来指导实际生活。这说明了“行”，即实践的重要意义，包括知识领域的践履和道德领域的践履。《论语》开宗明义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熹注：“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此“飞”字，便是对“行”，即实践而言。“飞”原是鸟的本性，鸟不能飞上空，将给它生活造成威胁，自不成其为鸟。“学”而不加上“习”，做到学、用一致，学落实于用，亦不成为真学、真知。从哲学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角度说，行实居于主导地位。《中庸》引孔子说“行”有多种途径：“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学而》记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与教育方面一般是先学好书本上的东西，然后才表现为实际行动没有矛盾。因为书本提供的知识，归根到底来自各种实践，但又要落实到实践。孔子十分重视“文”与“行”，或者说“学”与“行”的协调一致，《述而》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学而不厌”，“为之不厌”，在孔子思想中不存在什么区隔，因为“为”与“行”在这里是同义词。

总的说，为了让弟子们学得更全面、更深入，孔子从不同角度提出一系列严格要求，这在《论语》里都可以看到。例如《先进》篇说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说子张、子夏：“师也过，商也不及。”过了头和赶不上，都不好。《雍也》篇说冉求对孔子解释：“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指出：“力不足